

国际问题论丛



中印关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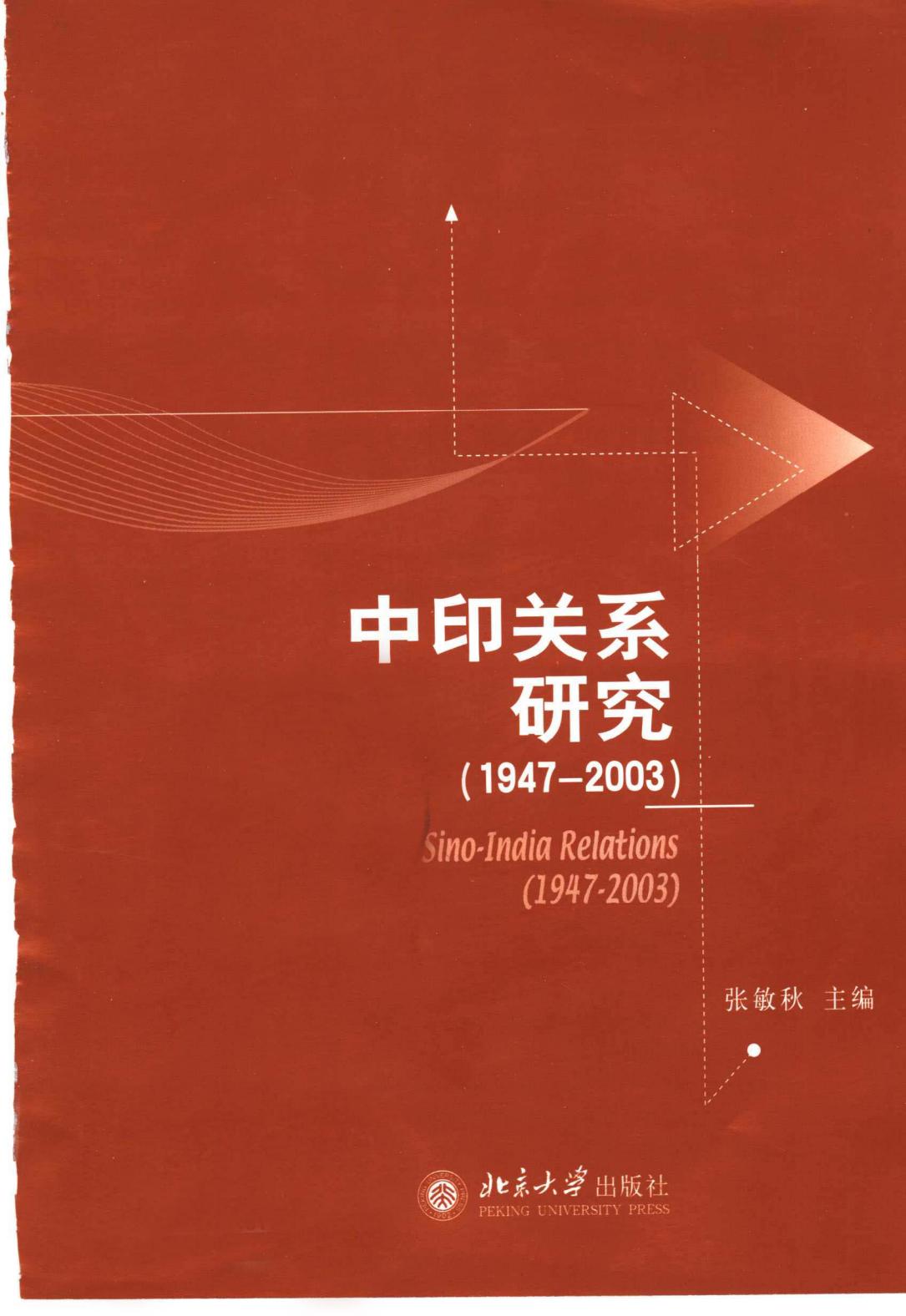
(1947—2003)

*Sino-India Relations
(1947-2003)*

张敏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印关系 研究

(1947—2003)

Sino-India Relations
(1947-2003)

张敏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张敏秋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6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7446-8

I . 中… II . 张… III . 中印关系 - 研究 - 1947—2003
IV . D822.3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283 号

书 名: 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

著作责任编辑者: 张敏秋 主编

责任 编辑: 耿协峰 张正旺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446-8/D·08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2.25 印张 347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主 编 简 介

张敏秋，女，1942年生于上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以后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从事南亚问题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主要论著有：《恒河明珠——塔塔》、《南亚政治和经济发展研究》（合著）、《印度：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合著）、《印度：科技与教育发展》（合著）、《印度垄断财团》（合著）。参与《转型中的印度经济》、《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现代企业制度与国外大公司》、《印度社会述论》等著作的撰写。此外，发表多篇关于印度和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印关系等方面的论文。

前言

本书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又是山水相依的邻邦。在两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两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据历史记载，印度的天文、数学、医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还有炼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的蚕丝、茶叶、瓷器、印刷术、音乐，还有改进后的炼糖术等也传入印度。两国还互派使节，交通和贸易往来频繁。当然最为壮观的交流是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随之，许多中国僧人不辞千难万险，跋山涉水，到印度取经求法，其中，著名的是5世纪的法显、7世纪的玄奘和义净三位高僧。中国人世代相传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就是取材于玄奘赴印度学习研究佛学十载的史实。同时，印度僧人到中国来的也不少。像中印两国这样绵延如此久长深厚的友好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恐怕是罕见的。

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中国与印度的往来中断了。18世纪中叶印度开始沦为殖民地，19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社会。两国人民都生活在外国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下。共同的遭遇，苦难的命运，两国人民之间有了新的了解和同情。进入20世纪后的一些年代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又得以复活。而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反帝反殖的斗争中，互相支持，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

争时期，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抗日前线，其中柯棣华大夫为中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并于1950年成立共和国，中国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两国一起走上了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道路。

然而，不幸的是，两个新生的国家仅维持了短暂的兄弟之情，20世纪50年代末便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到1976年才开始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二十多年来，通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虽然在不断地改善，但是并未成为真正相互信任的邻邦。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巴友好，以及安全等问题，还横亘在两国之间，严重地阻碍着双边关系顺利健康地发展。如果长此以往，势必牵制两国的精力，拖延双方发展的步伐，也不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今天，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需要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为此，两国都希望和平相处，也都反对单极霸权，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为加快经济增长，两国都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事务。因此，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两国必须携手。在国内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印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又有不少差异性，其中，许多领域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联手协作。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完全可以在合作与竞争中求得共同繁荣与富强。总之，中国和印度肩负着相同的发展任务，在广泛的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有待解决，但是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相互不构成威胁。只要双方真正有诚意，相互信任，互让互谅，就能够化解矛盾，弥合分歧，成为和睦的邻邦，合作的伙伴。

正是基于这个信念，我们对中印五十多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力图阐明事实真相，分清是非曲直，揭示合作潜力，了解大国因素，剖析深层原因，并初步探讨了解决矛盾的可能性。

在本书之前，近年我国有不少专家学者发表过这方面的论著，如赵蔚文的《印中关系风云录》、王宏纬（为本书撰写者之一）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刘学成的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

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师博主编的《1962：中印大战纪实》等。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到这个课题，如林良光、叶正佳、韩华合著的《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林良光为本书撰写者之一）、张植荣的《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马加力的《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等。此外，一些长期研究印度的学者如叶正佳、孙士海、华碧云、文富德、陈继东、张力等等撰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我们也看到了国外包括印度在内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较新的论著。如 R. K. Jain 主编的 *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Gyaneshwar Chaturvedi 的 *India-China Relations: 1947 to Present Day*, John W. Garver 的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 N. Dixit 的 *Across Borders: Fifty Year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卡·古普塔的《中印边界秘史》（中文版于 1990 年由王宏纬翻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Nevill Maxwell 的文章“*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Reconsidered*”，等等。美国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组织了几位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和印度问题专家正在研究“*Sino-Indian Relations——What America need to know*”，本人和王宏纬参加过与这几位作者的讨论，也阅读了他们尚未正式出版的文稿。以上所有的论著，为本书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或可参考的观点。

本书的宗旨是：在讲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着力于分析与研究；希望在前人研究的水平上，有所提高和深入，最终当然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推动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

本书有六章和一个附录。第一、二章由林良光教授撰写，第三章由王宏纬研究员撰写，后三章及附录由本人撰写和编纂。由于林、王两位完稿较早和其他一些原因，本人对他们的文稿略有补充和修改。

在本书付梓出版前夕，迎来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中国之行。瓦杰帕伊的访问以及访问之后两国关系的进展，显示了双边关系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本人又再度作了补充，从而也使本书的时间跨度延伸到了 2003 年末。

作为三人分头撰写的合作成果，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协调的地方，其他不足不当之处也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张敏秋

2003年12月

目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	(1)
第一节 中印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1)
一、印度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 创造了条件	(1)
二、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 国家	(3)
三、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相互配合与支持	(7)
四、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促成万隆会议的成功 ...	(11)
五、“兴地秦尼巴伊巴伊”(印地语:印度中国是兄弟)	(15)
第二节 中印关系的逆转与长期僵冷	(23)
一、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与中印关系	(23)
二、中印关系全面倒退和长期僵冷	(25)
第三节 改善关系的缓慢曲折过程	(30)
一、民间友好活动渐趋活跃	(30)
二、两国外长的互访	(32)
三、缓慢而曲折的改善.....	(35)
第四节 首脑互访开辟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37)
一、国际形势发展的积极因素	(37)
二、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开创了中印关系的新时期	(38)

三、印度地下核试验，两国关系受挫	(48)
四、两国关系的修复与发展	(50)
五、推动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60)
第二章 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	(65)
第一节 边界问题是殖民主义的遗产	(65)
一、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65)
二、印度政府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68)
第二节 中印两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73)
一、是否存在边界争端，两国立场南辕北辙	(73)
二、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	(75)
三、周恩来总理为挽救局势亲赴新德里	(80)
四、印度政府决心孤注一掷	(84)
第三节 边界战争及其影响	(90)
一、“里窝那”作战计划的出笼	(90)
二、短暂而激烈的边界战争	(92)
三、边界战争的影响	(98)
第四节 边界形势的缓和及其发展趋势	(103)
一、印度政府改变“无须进行谈判”的态度	(103)
二、边界问题副部长级官员八轮会谈	(105)
三、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的贡献	(108)
四、保障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措施	(111)
五、边界问题只能通过互谅互让和平协商解决	(113)
第三章 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	(117)
第一节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117)
第二节 西藏问题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	(122)
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蓄谋已久的侵略	(122)
二、英国对西藏政策的改变	(145)
第三节 印度要继承英国在西藏的遗产	(156)
一、不断侵占中国西藏的领土	(157)
二、怂恿和支持西藏的独立活动	(159)

三、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解放西藏	(162)
四、企图继续享有在西藏的特殊权益	(169)
五、支持西藏农奴主的叛乱	(171)
六、将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扩展到国际社会	(174)
第四节 印度政府新的政治承诺.....	(175)
第四章 中印经贸关系.....	(179)
第一节 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	(179)
一、互助互惠的 20 世纪 50 年代	(179)
二、中断 14 年	(182)
三、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恢复	(183)
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稳步快速发展	(185)
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推动 和工商界的努力	(190)
第二节 中印双边贸易状况.....	(201)
一、贸易额	(201)
二、贸易构成	(203)
第三节 贸易以外的经济合作.....	(208)
一、印度在中国的投资	(208)
二、中国在印度的投资	(211)
三、技术交流与合作	(213)
第四节 中印经贸合作的潜力.....	(215)
一、制药业	(215)
二、钢铁及相关工业	(217)
三、煤和炼焦煤	(218)
四、信息技术业	(219)
五、真丝绸缎业	(224)
六、农业	(224)
第五节 发展中印经贸关系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228)
一、有利条件	(228)
二、制约因素	(231)
第六节 在合作与竞争中求得双赢.....	(234)

第五章 中印关系中的大国因素	(240)
第一节 冷战扩展到南亚.....	(243)
一、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	(243)
二、印度推行不结盟政策	(244)
三、美国把冷战扩展到南亚	(246)
四、苏印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53)
第二节 美苏印联合反对中国.....	(256)
一、肯尼迪政府支持尼赫鲁反华.....	(256)
二、赫鲁晓夫联印反华	(264)
第三节 美中巴同苏印的战略对抗.....	(268)
一、国际局势进入缓和状态	(268)
二、苏联的全球扩张与南下战略	(269)
三、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	(271)
四、美国推行“重巴轻印”的南亚政策	(278)
五、苏印共谋对付中国	(286)
第四节 冷战后南亚战略格局的新变化.....	(297)
一、20世纪80年代美苏中印巴之间关系的互动	(297)
二、冷战结束对南亚的影响	(302)
三、美中共同面对印巴的核试验	(304)
四、建立中美印之间的正常互动关系	(309)
五、俄中印关系的稳定发展	(316)
第六章 消除障碍,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	(324)
一、关于边界领土争议	(324)
二、关于西藏问题	(330)
三、关于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	(334)
四、关于安全问题	(341)
附 录	(345)
一、中印关系大事记	(345)
二、中印关系重要文献选辑	(370)

第一章

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中印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一、印度的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国际政治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欧洲主要国家的力量遭到削弱，欧洲不再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苏联经受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政治和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主力军。一批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美国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且乘机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战争教育和锻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他们的民族民主意识和觉悟迅速提高，为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印度和中国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相继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中国和印度虽然国情不同，所走的独立道路不同，然而这两个昔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兴国家，无疑大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图在全世界建立独霸地位。1947 年

出笼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成为反苏反共的动员令和实施计划。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针锋相对，先是组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1955年建立华沙条约组织。这样，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和抗衡便成为战后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

处于夹缝中的广大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有的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有的虽已挣脱殖民主义枷锁，但在国际事务中只能扮演三流的角色。中国作为新生的共产党国家，又是亚洲大国，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需要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方针，其基本内容有：(1)“另起炉灶”；(2)“一边倒”；(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礼尚往来”；(5)“互通有无”；(6)“团结世界人民”。^①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坚定性和政策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坚持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残余势力，坚决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在一边。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同情支持中国，或至少保持中立，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采取团结友好的方针；在与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中，采取了灵活的政策。

印度无论幅员、人口还是发展潜力，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它的领导人怀有强烈的改变印度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愿望，因此，它要寻求自己在世界上的适当位置。印度独立后就确立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基本方针：联合第三种力量，独立于两个阵营和军事集团之外，游离于他们之间，以追求最大的战略利益。印度领导人认为，中国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政策中起着比共产主义更为深刻有力的作用；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使得它不会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教条，是

^①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 50 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20 页。

西方的遏制政策使中国密切同苏联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民，他们只是“遥远的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友好能引导它成为亚洲和平的堡垒。^①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印度领导人认为，印中应当而且可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二、印度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相继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桎梏后，如何相互理解、相处、交流和合作，无论在领导层还是在平民百姓中，对此均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相互评价新政权的性质。对印度独立，中国政治界和舆论界的看法就存在分歧。一方面，如刘少奇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印度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因此，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无产阶级应当同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按照机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印度以和平方式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在诸多领域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得以保留，在政府部门和武装部队中前宗主国的官员依旧大权在握，因此这个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彻底的，其政权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值得怀疑的。1949 年 9 月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一篇文章就直截了当地说，印度仅仅在两年前获得自治领地位，还不是正式的充分意义上的独立，原因在于在印度执政的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他们标榜的民族主义甚至远不如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②而在印度，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误解、忧虑更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与尼赫鲁一起被称为圣雄甘地左膀右臂的印度独立后首届政府副总理瓦拉帕依·巴特尔在 1949 年 11 月得悉尼赫鲁总理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给尼赫鲁写了一封长信，担心“这一（中国革命）胜利，无疑将鼓励邻国的骚乱势力并将鼓励颠覆分子制

^① 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1949—1999）》，时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24 页。

^② *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edited by R. K. Jain, Vol. 1, New Delhi, pp. 7—9.

造麻烦，而他们可能利用这些麻烦捞取政治利益”。他提醒尼赫鲁对中国军队向南挺进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如此，两国政府和政治界、舆论界的主流还是主张中印两个刚刚站起来的亚洲大国应当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并且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于1949年10月7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仅一周就电告周恩来外长，表示已经注意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印度政府将“谨慎考虑”由此产生的局势。12月30日，印度政府致函周恩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愿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是继缅甸之后第二个做出这种决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天，印度在南京的前使馆秘书雁蔼森申明，印度政府业已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并通知其驻新德里大使馆停止一切外交活动。1950年1月4日，周恩来复电尼赫鲁，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印度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希望印度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进行谈判。从2月中旬开始，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印度政府指派的代表雁蔼森就建交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印度政府就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澄清之后，两国政府于4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互派大使。印度虽比缅甸晚半个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正式建交却比缅甸早了两个月。这两个国家开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与中国建交之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抵制了某些领导人和舆论界的不和谐的声音，采取积极友好的政策。1950年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苏联关于将国民党集团从安理会开除出去的提案时，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投了可贵的赞成票。也许正因此，中印关于正式建交的谈判进展顺利。中国政府在实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时，对印度采取了与对美、英等西方国家不同的政策。众所周知，印度独立时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继承了在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些特权，这些特权的存在与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是不相容的。然而，在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中国方面并没有提出立即取消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而主要围绕印度政府对国民党集团及其在国际机构的合法性这个问题进行。中国政府的这种“区别对待”的外交政策从一开始就得到鲜明的体现。

尼赫鲁力排众议,果断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值得称道的,而且业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尼赫鲁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是他和印度政府其他领导人对印度应当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的看法。尼赫鲁关于印度应当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应当在亚洲地区、在从亚丁到马六甲海峡广大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名言,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作为实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印度必须走出南亚,在亚洲充当老大,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印度独立前成立的临时政府中,尼赫鲁作为国大党领导人登上了副总理的宝座。1947年3—4月间,临时政府成立仅半年,尼赫鲁就积极地召集亚洲国家在新德里举行了第一次亚洲关系会议。会议组织者宣布,会议主要讨论亚洲国家共同关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而不涉及有争议的政治议题。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28个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均在被邀请之列,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发给护照,中共代表未能成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临时政府的蓄意安排下,西藏“噶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企图作为独立国家的代表身份进行活动。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严重交涉,印度政府才予以纠正。尼赫鲁俨然以亚洲领导人自居,在会上作开幕演说,为会议定了基调。按照尼赫鲁的计划,会议建立了一个亚洲国家间的机构——亚洲关系组织,尼赫鲁当选为主席。本来依据会议达成的共识,这个会议及其组织机构还要继续存在并不断完善,后由于中国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这个计划自然寿终正寝了。^①

应当承认,无论印度国大党还是尼赫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总体说来是同情和支持的。1938年5月,应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宋庆龄的要求,国大党年会通过一项决议,派遣一个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抗日。这个医疗队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致电尼赫鲁感谢他派遣医疗队的义举。

^① X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 Lanham, 1994, pp. 82—84.